

良马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 李光宗

在社会生活中，人类对精致而美好物品的向往从未停止，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实用角度，精致而又美好的物品总是能够给人带来生活的便利和愉悦的享受。尤其是来自域外的物品，赋予其神秘感的精致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来自域外的宝马良驹也是如此。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马的生长和驯化，尤其是良马的生长需要特定的气候和植被环境。一般来说，游牧文明所生活的草原地区出产的马品种优良，其速度和耐力较强，而农耕文明所生活的地区出产的马品种较差，多用于挽驾驮载，而不适宜作骑乘。因此，农耕地区便需要从游牧地区引进良马，良马贸易便应运而生。

良马的功用

良马贸易普遍存在于历史各个时期，不同历史时期规模和表现各有不同，其中，唐朝与域外游牧民族的良马贸易对唐代社会生活影响极为深刻。良马贸易加深了唐人对域外良马的认知，进而深化了唐人对宝马良驹的挚爱之情。

骑马出行的风尚由来已久，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相继建立政权，中原地区在北方游牧民族骑马风气的影响之下，骑马之风逐渐兴盛，不论是武将还是儒士皆善于骑马。马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且骑马也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另外，中古时期游牧民族的内迁，对中原地区的种族血统、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思想观念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中原地区，诸多学者称之为“胡化”。反映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骑马出行娱乐便是其中之一。

唐朝混一南北，和平稳定的局面以及多元文明互动下的社会，骑马出行及娱乐更是兴盛，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有唐已来，三公已下车辂，皆太仆官造臆掌。若受制行册命及二时巡陵、婚葬则给之。自此之后，皆骑马而已。”除了祭祀、册命等重大礼仪之外，其他时候外出基本上骑马，骑马出行之风遍及整个唐朝社会，这种风尚加深了唐人对宝马良驹的需求和渴望。

域外良马进入唐朝之后，最优良的马匹总会被挑选出来送进皇宫，《新唐书·百官志》曾记载：“献马则殿中、太

仆寺莅阅，良者入殿中，弩病入太仆。”骑乘优良的马匹带来的愉悦感加深了唐人对宝马良驹的喜爱。据史书记载，北方的骨利干曾献良马十四，唐太宗对其大加赞赏，亲自为之制名，号为十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骊，三曰凝露骊，四曰悬光骊，五曰决波骊，六曰飞霞骊，七曰发电赤，八曰流星驪，九曰翩翩紫，十曰奔虹赤。”可见其对宝马良驹的热爱。

这些最优良的马匹大多用作皇帝骑乘，其中又有大量的良马赏赐给王公大臣及武将。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些马的来源，但推测这些良马多来源于域外，通过贸易方式进入中原，选拔最优良的马匹进入皇宫，然后由皇帝赏赐给大臣的。骑乘这些赏赐的域外良马自然十分惬意和荣耀。

在唐三彩中，各种姿态的宝马或奔跑，或静立，栩栩如生，从其矫健的姿态外形来看，便知这些宝马是从遥远的北方草原而来。出土的大量唐三彩中，马在数量和质量中占有绝对优势，可以想见唐人对宝马良驹的热爱。

唐代与北方游牧民族良马贸易的繁荣更彰显了唐人对良马标准的认知。在《唐会要》“诸蕃马印”中，人们将骨利干马、突厥马、回纥马等北方草原马作为良马的标准参照，“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其他马种或与其相似、或在其之下。给来自不同地区的良马烙以不同的印记，从唐代马印的完备角度看，引进外来良马的数量巨大且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

唐人不仅仅骑乘北方草原来的宝马良驹，而且还将其用作娱乐，其中舞马便是典范。唐中宗景龙年间“殿中奏骝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枝具装于鞍上，加麒麟首飞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宛转中节，欲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舞马艺术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鼎盛。此时的舞马表演不仅数量非常多，动辄“以马百匹”，而且表演时精心装饰，挂着各种铃铎盛装出场，分左、右在三层重榻之上起舞，和着《倾杯乐》的美妙音色，“骤首奋鬣，举足踟蹰，变态动容，皆中音律”，最后衔杯向皇帝祝寿。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讲道：“这些舞马应该属于外来的珍奇异物。”他认为“月窟龙孙四百蹄”中的“月窟”就是李白诗中提到的西突厥斯坦的“月支窟”，这种舞

马应该是从西域或中亚传来。域外的舞马也成为唐人认知世界的载体，王永平在《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认为：“研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物种、技术、方法和社会风俗与思想观念的交往和传播，对于理解当时中国对于世界的了解与认知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域外世界的认知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去理解的，往往是通过物种、娱乐、文化等具体载体来认知的，舞马就是一种物种与文化的结合体。唐代时人通过舞马认知域外世界，同时借助舞马向世界展示盛唐繁荣。

唐人对良马的热爱

我们还可以从唐代文学及绘画作品中窥见唐人对域外良马的热爱。

唐代鞍马画以韩幹所作最为著名。韩幹重视写生，以内厩之马为师，遍绘宫中及诸王府之名马，而這些名马大多是来自域外的良马。他曾作《玉花骢图》《照夜白图》《牧马图》《胡人呈马图》等，所绘马匹肥硕雄骏，富有盛唐时代气息，反映了良马贸易影响下鞍马画风的转向。杜甫曾作诗赞美这些鞍马图：“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曾观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

域外良马的到来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诗人用笔墨肆意抒发着对宝马的热爱。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写道：“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鞵黄金勒……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杜甫在《天育骠骑歌》中写道：“毛为绿骠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诗人笔下的骏马充满了浪漫色彩，它们具有雄姿英发、气度不凡的形象，以及乐观向上、慷慨豪迈的精神气质，这些诗句，充满了诗人积极乐观，要求建功立业豪情。

总之，唐与游牧民族的良马贸易不仅对唐代的军事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宝马良驹的热爱融化在唐人的血脉之中，造就了唐人恢宏的气魄，正是这种恢宏的气魄成就了大唐盛世。

文明之路

战士长歌入汉关

天山形成于二三百万年前，在世界现今的山系里属于比较年轻的一类。它深居欧亚大陆的腹地，是世界上距海洋最为遥远的山系。天山整体呈东西走向，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全长超过2500公里，其中有1700多公里位于中国境内。而它的最高峰托木尔峰，海拔则高达7443.8米。在中国，天山的主体基本都在新疆，它是新疆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在天山的南北两面分别是位列中国四大盆地的准噶尔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也即南疆和北疆。

天山虽然处于西北边陲，但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文字记载里。成书至少在战国的《穆天子传》中就曾写到，周穆王驾八骏西巡来到天山，遇见了传说中的西王母。穆王赠送给西王母大批中原的特产，而西王母也回赠以天山的奇珍异宝。二人一同游览天山，临别时西王母还即席作歌，希望明年能与穆王再会。

穆王的事过于久远，西王母更只是一种传说。不过在唐代，天山却曾实实在在地见证过一个活着的传奇。前面提到唐代频繁向边疆用兵，也是因为唐是中国历史上边患较多的一个朝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样金戈铁马的时代，必然少不了驰骋沙场、百战百胜的名将，所以薛仁贵出场了。薛仁贵本是山西绛州龙门县人。贞观末年，唐太宗御驾亲征，出兵辽东。由于朝廷兵力有限，因此决定在地方征兵。薛仁贵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征入伍，投入将军张士贵的麾下。大军到达安地时，即将刘君昂陷入敌人的包围，情况十分紧急，而前来救援的正是薛仁贵。薛仁贵领兵到达后，一马当先地冲向敌阵，几回合之内就手刃敌将，还把他的敌头颅砍下来系在马鞍上。剩下的敌军见到薛仁贵如此神勇，又惊又怕，纷纷放弃抵抗，投降唐军。薛仁贵由此一战成名。辽东这一战薛仁贵只是崭露头角，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舞台等待他表现。

到了唐高宗龙朔元年，北方游牧民族铁勒的九个部落一起兴

兵来犯。薛仁贵奉命出任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前往讨伐。临行前，唐高宗命人拿出一副自己收藏的盔甲想要赐给薛仁贵，不过在此之前他想想试试薛仁贵的箭术，也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盔甲。于是高宗就对薛仁贵说：“我听说古时候箭术高超的人一箭就能射穿叠在一起的七层盔甲，你试试能否射穿我这五层的好盔甲。”薛仁贵当即张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五层盔甲一下子就被洞穿。唐高宗见状大惊失色，没想到自己认为坚固的盔甲竟如此不堪一击，于是立刻换了一副更加坚固的盔甲赐给薛仁贵。

铁勒的九个部落听说唐朝大军来了，便集结起十万军队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等到薛仁贵的部队到达，两军对阵之际，铁勒派遣数十名骁勇的将士前来叫阵，欲要杀一杀唐军的威风。薛仁贵却不为所动，他从箭筒里抽出一根箭搭在弦上，用力拉开弓，手一松箭如流星赶月般飞出，如此连射三箭，敌将三人应声落马，当场毙命。其他人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忙不迭下马请求归降。薛仁贵担心放过他们会留下后患，就杀了他们。然后他安排敌军剩下的部队，在擒住了伪叶护兄弟三人之后胜利还朝。一场大战因为薛仁贵的神勇最后消弭于无形，他靠一己之力就扭转了整个战局。无怪凯旋的士兵们在途中大声喊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而从此以后，铁勒九大部落一蹶不振，再也无力为祸唐朝边境。这般超凡的武艺和显赫的战绩，放眼唐代几无人可比。

真是男儿一丈夫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文治武功都足以睥睨历朝。它国力强盛而又积极进取，不同于宋代极度偃武修文，唐人对于边疆事业有极大热情。从军不被认为是一件卑贱羞耻的事情，相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的风气。诸多诗人投身边塞、深入军队，借助这一契机，他们对远隔普通民众甚至是官员视线的戍卒征夫

『三箭定天山』的传奇

画卷开时塞外云（二）

□ 童泳洋

生活有了全面了解。

边塞文学并非是唐人首创，但唐代的边塞诗与以往边塞文学却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创作主体上。唐代一位身份卑微、文化水平不高的“西部人”也敢于用自己的笔发出“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时代强音，而不再是文人的专利；更重要的是，唐人在继承汉以来边塞诗文里苍凉悲慨的胡笳之音的同时，还以乐观高昂的精神去改造它。唐代边塞诗里除了有传统的将士悲苦生活的描写，又增加了大量将士坚毅果敢、英勇善战的内容，字里行间洋溢着唐人的非凡自信和高涨的报国热情。如果说前者是“苦战”的话，后者就是“善战”乃至“乐战”了。

中华春秋



甚至发生武装对抗等，局面就将难以控制。

综合治理西湖

据笔者目前所知，在宋人中把水土环境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考察，而其思想比较深刻突出的当首推苏轼。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以朴素的系统生态学眼光，阐述了杭州如没有西湖之水，那么滨湖区地区生存的生物、居民饮水、农业灌溉、水运以及酿酒用水都将出现问题，也就是水土生态系统中只要一个基本子系统出现故障，将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在此基础上，苏轼提出了治理西湖要“开浚茅山”；“宜于铃辖司前创置一闸”，既可阻挡潮水侵入淤塞，又可放水流入茅山河和盐桥河，避免两河涸竭之患，有利于灌溉；引河水注入西湖，“则西湖活水之所注，永无乏绝之忧矣”，解决了滨湖地区居民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问题。总之，苏轼的三条措施紧紧围绕解决西湖之水这一关键根本问题，从而带动西湖整个水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存环境、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水运等相关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还就治理西湖的经费筹集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他主张通过出卖度牒筹集最初的开湖启动经费，待湖面开成之后，作为菱荡租佃，以所得课利钱逐年雇人开葑撩浅，以湖养湖。这是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能为民办实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史 镜

苏轼（1037—1101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著述甚丰。他仕途坎坷，历任中央与地方官职，关心民生疾苦，多惠政，敢于针砭时弊。其经济管理思想有诸多独到之处。

安商利商

苏轼把农、工、商三者视为“养民”所必备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他曾经提出罢官营榷盐的建议，这样做是为了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归业。他指出，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经营，采取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大幅度提高价格卖出的手段，以牟取暴利。由于价格太高，老百姓买不起，致使官盐大量积压，一二年后变质成为废物，最后亏损的仍然是国家。因此，他主张“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

苏轼不仅反对官营工商，而且还认为，对私营工商应减轻其赋税负担，使他们安于本业，能够正常的发展，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他于熙宁七年（1074年）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指出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是变法期间，盐税日增，使当地百姓不堪其负，“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为此，他请求朝廷免税，许可小盐贩自由贩卖，才能使贫贱之民，“一归于盐”，不再为盗贼。苏轼这一主张不仅使小商贩重新有了生路，而且对大商人、国家财政收入也有益处。因为政府允许小盐贩免税自由贩卖，从而扩大销售范围和数量，“乡村僻远，无不食盐，所卖亦广”，促进大商人扩大批发业务，带动整个盐业从生产到销售、收入分配、消费等各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人口结构与分布

苏轼在《隋文帝户口之蕃仓廩府库之盛》一文中提出，古代以人口多少作为国家贫富标准，这有其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口数就是参加生产的人数，人口的多少决定创造财富的大小，因此国家重视招徕人口以强大自己。北宋户口之多超过前代，但与国家贫富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便于为官府提供徭役。宋代人口之多甚至成为祸患，这是因为参加生产的人太少，而非生产的人太多，所以造成国家与老百姓都十分贫困。

苏轼提出的人口多寡与国家贫富无关的观点，在封建社会是独树一帜的。显然，苏轼是想把传统的“人众国富论”修正为“生产者众国富论”。这里，苏轼已触及人口结构问题。按苏轼的观点，从唐中叶开始，人口的结构已严重失衡。到了宋代，军队、官吏、宗室贵戚人数大量增长，导致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结构比例失衡比唐中叶以后还更加严重，所以造成民穷国弱的困境。

苏轼对于当时一些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均户口”，通过移民以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均匀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为了使移民能在新迁入地安居乐

□ 方宝璋



业，苏轼主张对移民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应向移民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耕耘的农具，使他们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刚开垦的土地收成较少，所以应该缓交地租少交地租。总之，让移民在新居地能生存下去，这样才能使人口分布趋于均匀，“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

宋代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分布不均匀，使得人与土地的矛盾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是有些地区人众地狭，许多人无地可耕；二是有些地区地广人稀，大片土地得不到开垦。这两种极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相同，即人地冲突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有机结合，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

得不到合理配置。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提出了以一定的优惠政策迁徙人众地狭地区的人口往地广人稀的地区，通过移民以调整人地关系，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从而使人口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社会救济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时预测到浙西诸郡来年青黄不交之际，米价必贵，因此，运用价格杠杆提高高平仓收余农民米价格，使农民米尽归常平仓，诸郡富民“广行收采，以规厚利”的计划落空。从此可

对于已发生的灾荒，苏轼主张应尽早赈济，否则灾荒会越来越严重，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引起灾民流移，